

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

范雲** 張晉芬***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Ethnic Differ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aiwan by Yun FAN & Chin-Fen CHANG

關鍵字：省籍、教育階層化、高等教育、教育補助費、軍公教部門

Keywords: ethnicity,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public sector

收稿日期：2008年3月14日；接受日期：2009年3月5日。

Received: March 14, 2008; in revised form: March 5, 2009.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週五論壇，感謝當初與會者，以及之後譚康榮(Tony Tam)、林南(Nan Lin)、陳婉琪與曾熾芬對於本文初稿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作者也要謝謝葉盈蘭與江淑琳協助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張逸萍與張譽馨細心地協助製作表格與校稿。最後，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的詳盡指正。當然，所有的疏漏，概由作者負責。

** 服務單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E-mail: fanyun@ntu.edu.tw

***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E-mail: chinfen@sinica.edu.tw

摘要

在討論台灣戰後教育的階層化時，如何解釋外省族群子女的平均高教育成就持續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經常被簡化為外省族群長期受雇於軍公教部門，因此軍公教部門所提供的教育補助，是造成外省族群子女較易獲得高教育成就的主因。本文借用西方族群研究以及國內教育階層化文獻，從省籍間社會結構位置的差異性，試圖檢證這個說法的有效性。利用1999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的資料，本文檢視軍公教部門及教育補助政策的效果，及相對於家庭背景的解釋力。以是否取得大學或更高學歷作為依變項，本文發現，在加入父親的階級和教育變項之後，軍公教部門的效果變得不顯著。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的領取持續具有顯著效果，但解釋力偏低。整體而言，由於外省籍父親輩的平均教育程度較閩南及客家族群高，同時也有較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因而提高了外省籍子女取得較高教育成就的機率。根據分析結果，本文認為，關於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應該更細緻地去理解族群集體生命歷程的差異、移民後社會結構位置、以及在特殊情境下族群特殊社經組成的影響。更多對於教育機會平等的關心應放在探究如何改善農民及勞工階級子女的教育機會。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topics in Taiwanes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has been how to explain the relatively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mainlanders in post-war Taiwan.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since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re entitled for educational subsidie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ainlanders seem to concentrate in public sector, th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ers are able to achieve higher educational statu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favor. Other studies show that family background is still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ethnic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alyzing the data of “Basic Social Survey of Taiwan Ethnic Relations” conducted in 1999, we find tuition subsidies to have significant but limited power in the equation. Father’s education and class status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respondent’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We conclude that past argument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uition subsidies need to be questioned 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king and farmers classes.

一、前言

關於台灣的教育階層化研究，過去學者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在這些研究中，省籍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持續成為關注的重點。多數研究發現，與其他族群相比，外省族群子女擁有平均較高的教育成就(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王宏仁 1999；駱明慶 2001；陳婉琪 2005)。即使有研究者發現這個差異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甚至變得不顯著(陳婉琪 2005)，但是，如何解釋省籍之間的教育成就差異仍然是個焦點。這些研究結果，大約可以區分出兩個不同的方向：多數的研究發現，在控制父母親教育成就、家庭社經背景、城鄉差距、家庭子女數，以及公部門的效應後，族群身分本身不具有影響力(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王宏仁 1999；駱明慶 2001；陳婉琪 2005)；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即使控制了上述家庭社經背景之後，族群身分仍然具有獨立的影響力，例如族群的語言資本等(蔡淑鈴 2001)。隨著新資料庫的建立，這些持續不斷的學術對話也出現更細緻的發現。例如：晚近陳婉琪(2005:1)藉由較大的樣本數進行拆組與次群體比較分析後，發現「對高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來說，並沒有統計證據顯示，省籍對於任何出生世代之上大學機會有影響；但在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中，則存在相當顯著的省籍效應」。

綜合過去研究的發現，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社經背景或家庭手足、城鄉差距這類涉及社經背景的變項，較無爭議。公部門效應及教育補助等具有政治排除效果的變項效應，則似尚無定論。過去台灣社會關於族群正義的討論，集中在政治領域內權力分配的不均。將省籍與教育成就取得的差異歸因於「政治力」，則是將族群正義的關懷從政治領域擴及到社會流動的公平性。有些研究者在詮釋為何任職於公部門會影響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時，將公部門效應等同於政治性教育補助的結果。例如，吳乃德(1997：164)在發現公部門變項具有顯著效果

時，做了以下的結論：「除了教育補貼外，我們實在無法找出其他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本文的結論是：政治力量是造成本省籍民眾和外省籍民眾在社會地位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吳乃德 1997：136）。針對這個政治力的解釋，之後的研究者卻較傾向於現有教育階層化文獻的說法，也就是將教育成就歸因於個人所屬的家庭經濟地位。例如，王宏仁（1999）發現，由於小學與初級中學是義務教育，因此在這兩個階段公部門教育經費補助的影響並不大。針對公部門有哪些特性會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駱明慶（2001）則提醒除了教育補助之外，還可能有社會資本的效果，例如公部門內的社會網絡可能提供有利於子女升學的資訊。整體而言，這些針對公部門特質以及其是否等同於教育補助政策的討論，雖具有啟發性，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也都僅止於作者的推論。

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族群間教育成就差異是否源自於政治力這個敏感議題，研究者應當盡可能細緻、反覆地討論。沿著現有文獻發現的線索，本文想要探討的實證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公部門效應」？公部門是否即代表「教育補助政策」？公部門和教育補助政策是解釋台灣省籍間高等教育差異的重要因素嗎？

二、文獻探討

由於研究成果相對較為豐碩，我們首先回顧西方學者關於族群間教育成就差異的相關解釋，作為本文的借鏡。其次，我們將藉由整理國內的文獻，提出本文試圖檢測的幾個解釋機制。

早期西方學者傾向於從生物遺傳的觀點解釋族群之間教育成就的差異（van den Berghe 1967）。這樣的解釋方向，隨後很快就被族群文化特質論反駁與取代。後者主張，並非所有的族群文化與信仰都會鼓勵或壓抑子女的學習，其中有極大的差異存在；但這些文化特質論者卻

又同意，隨著移民時間的增長，在移入族群逐漸被「同化」後，族群間的成就差異會逐漸減少(Bodnar 1976; Child 1943; Goldscheider and Zuckerman 1984; Warner and Strole 1945)。延續這條辯論軸線，多元文化論者批評文化趨同論的說法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多元文化論強調移民會主動地形塑自己的文化以適應所移入的新社會(如，Greeley 1976)，未必完全採納「主流文化」的意識型態或價值觀。

事實上，每個不同的族群移民到新社會後，都會因為該族群座落在新社會中不同的結構性位置，而展露出一些獨特性。就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而言，相對於前述各種文化論者採取單一決定性因素解釋移民子女的教育成就，Joel Perlmann(1988: 219)認為：「族群是獨特歷史的產物。我們不需要尋求單一的主要變項來解釋族群的特質，也沒有一種單一的概化可以囊括幾個因素之間的所有關係。更好的方法是以比較的觀點，著眼理論，來探索個別的族群歷史。」他與幾位研究者因此主張，族群間不同的社會結構位置才是造成子女教育成就差異的主要原因。他們所提出的「社會結構位置」概念包括該族群的第一代階級組成、教育背景、家庭資產與經濟生產模式、家庭人數、以及居住地區的集中與分布等(Hirschman and Falcon 1985; Perlmann 1988)。

為驗證社會結構位置的解釋，Perlmann(1988: 203)針對美國普羅威頓斯地區(Providence)的住民進行研究，發現不同族裔子女是否進入高中、所受的教育年數，或是之後所擁有的職業，有極大程度是受到該族群原生家庭社會結構位置的影響。家庭階級身分、經濟生產模式，家庭資產以及家庭子女的數目，共同解釋了普羅威頓斯這個地區1880年之後，族群間的重要教育成就差異。Perlmann的發現和他所提出的解釋與後來台灣或國外社會學家使用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分析後的結果相當類似。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及台灣的特殊性，本文將台灣教育階層化中省籍差異的因素分成四個機制，包括外省第一代移民者的人力資本、階級特性、軍公教人員的特殊部門優勢、及群聚的現

象。以下我們分別論述這些機制的內涵。

(一)政治移民的高人力資本

親代教育背景對於子代教育成就的顯著影響，早已經獲得研究的支持，且是跨文化、跨時間的社會現象；有些研究顯示，教育背景代間傳承的機制甚至是獨立於階級之外。以台灣的研究為例，Tsai(蔡淑鈴)與 Chiu(瞿海源)(1993)即發現，在中學以上學歷的取得上，族群身分的效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親的職業、教育程度以及居住於都會區與否。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則發現，在控制職業背景之後，父親或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的教育成就也較高。這兩位作者指出，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升學的篩選是以考試制度為主，考試成績的評定也多符合公平原則，教育的取得與廣義的文化資本有關，包括家中讀書環境以及父母對子女教育資源的投資程度。

放在台灣族群組成的發展脈絡中來看，外省與本省父母間的平均教育成就差異，一直被認為是解釋省籍間教育成就差異的重要原因。以較近期的一項研究為例，Chen(陳玟君)與 Lin(林毓玲)(2005)指出，控制父母親的社經背景，特別是教育程度後，外省族群相對於閩客族群的教育優勢幾乎完全不存在。¹她們因此論述，影響外省族群教育成就高於其他族群的是父母的「偶然性的族群組合」(incidental ethnic composition)，而非政治排外(political exclusion)政策。後者指的即是教育補助費政策，前者指的則是台灣族群組成的一個特殊現象：外省移民的平均高人力資本。

外省族群在1945年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遷徙來台超過一百萬人，並不是當時中國人口的隨機選樣。²這群政治移民或難民(political

1 她們所分析的依變項是教育年數。

2 根據王宏仁(1999)整理的資料，從1946年到1957年期間，由大陸移民來台灣的平民超過了一百萬人，大部分是在1949年之後來的。

refuges)的組成中固然有被抓來充軍的大量低階士兵，但也包括國民黨政府的大批文官或將領，或是為了躲避戰亂的地主家庭子女、商人、文化工作者等；這些人的共同特徵之一即是平均教育程度高於當時的中國大陸民眾(齊邦媛、王德威 2004)。如果親代的教育程度是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外省移民的高教育程度自然也會提升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

(二)外省移民的階級特質

另一個幾乎與教育程度同等重要的家庭背景因素是職業階層；或者用更結構性的說法，即是階級。階級如何影響教育成就，有幾種解釋。其中之一是「期望論」，強調父母所屬階級的經驗會影響到其本身對於教育的價值觀，以及對待子女的態度和管教方式(Kohn 1984)。白領階級對於子女的教育期待較高，也較可能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子女的學習興趣；相對的，藍領家庭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較低，也較可能以直接訓斥的方式，要求一時的成績。另一種說法則是強調「職業的傳承」，白領家庭較可能期待子女繼續從事白領性質的工作，而這些工作通常需要較高的學歷作為進入的門檻。藍領家庭也較可能傳承較為熟悉的技藝或行業給下一代，相對而言，他們也比較不會特意鼓勵子女追求較高的學歷。另一個晚近興起的說法則是「文化資本論」，認為上一代的社會階級背景對下一代教育成就的影響，至少有部分機制是透過對子女文化資本的直接傳承或投資(Bourdieu 1977)。

當然，階級的差異不只是展現在文化面或價值觀上，還有經濟面的影響。階級結構的內部區隔除了資產或所得之外，也包括經濟活動的參與方式，例如被雇或是自雇；穩定的經濟來源，或是變動性較大的生存模式；生產方式屬於勞力、技術、或知識密集等。這些區隔會影響家中成員參與經濟活動的可能性、性質、或程度。Perlmann (1988)即發現，對於經濟生產模式是以勞力投入為主的第一級產業或

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較需要子女提早進入就業市場，分擔經濟生產工作，以維持家中的經濟水平。因此相對於其他階級身分的家庭，農業或勞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成本較高，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即可能受到負面的影響。他比較美國愛爾蘭裔、義大利裔，猶太人以及非洲裔的教育成就後發現，個別族群對於子女教育重視與否是其移民前的文化特質與移民後的社會結構位置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猶太人對教育的重視，會因為其移民後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而更被強化，而義大利觀念中孩童應當貢獻於家庭經濟的想法，應是反映父母親成長於工人或小資產階級背景的經驗。父母親的階級及所擁有的資源多寡，會影響其對於子女工作前景的認知、對教育的價值觀以及小孩是否應立即貢獻於家庭經濟的判斷，進一步形成子代教育成就族群化的差異（Perlmann 1988: 217）。³

在台灣戰後的歷史中，不同省籍間的階級區隔也頗明顯。先從產業的分布來看，本省籍就業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一級產業(45%)，其次是第二級產業(18%)，從事第三級產業的比例相當低。以農業而言，閩南人是主要的就業人口；這個族群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較高。相對於外省人中有高比例是白領階級，閩南或客家族群則較集中於藍領階層。根據王宏仁(1999)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所做的分析，在1950年代外省人的職業分布中，有將近18%是軍人，同時也有較高比例屬於資本家與中產階級。依據社會結構位置的理論，此一本、外省族群階級位置的差異應該也會反映在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和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

3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Gary Becker 所提出的新家庭經濟論(1993)也持類似的論述。認為父母在考慮是否讓子女繼續升學時，會理性地評估家戶內的資源分配，做最有效率的運用。但我們認為，Joel Perlmann 的說法及發現更細緻地呈現了階級的作用。

(三) 公部門作為族群主要經濟模式

在台灣的社会及政治結構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是外省人高比例出現在軍公教部門；這當然也是與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有大批軍公教人員跟隨來台有關。其次，作為新移民，其個人和親屬網絡的限制，使得這些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外省人較難看到或找到公部門以外的就業機會。除了網絡限制與公部門的直接誘因效果之外，缺乏農地、資金、其他的謀生技能、及不諳閩南語或客家語等因素，也可能促使外省族群認為離開公部門不易得到發展機會。鍾基年針對外省第一代的訪談，即透露出外省族群對子女未來工作機會的認知及評估：

沒有事業基礎，沒有土地、沒有錢、基礎差，你不做公教人員做什麼？假如我們有田地、有工廠、那麼幹嘛做公教人員。第二代也是一樣受這個影響，最主要就是沒有田產……（鍾基年 1993: 34）

……眷村的人喔，沒考上大學，都會回到軍校。（鍾基年 1993: 68）

鍾基年發現，由於缺乏祖產與廣大的親族網絡作為風險的緩衝機制，外省第一代傾向於認為私部門不穩定、或外省人在其中可能沒有發展，而希望第二代繼續往公教部門發展。如果其子女沒有高教育成就或是進不了公教部門，就傾向於選擇到軍校或軍隊發展。讀書進公教部門，或是去當軍人成為外省族群的主要職業選擇。

由於公部門的升遷、薪資結構皆與文憑高度相關，如果父母期望下一代進入公部門，也可能更為重視子女的學歷高低，因而對子女會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期待。由於外省人有高比例出現在軍公教部門，這些人對子女的高教育期望自然也會提高外省族群的整體期望值。林鶴玲（1998）即發現，在控制其他背景條件後，外省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是各族群中最高的，其次是客家，然後才是福佬族群。⁴ 這個發現間接地支持了這樣的觀點。

然而，如同我們前面所述及的，過去的研究皆發現公部門背景是解釋外省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變項，即使這個因素隨著歷史的演進已漸趨緩和，⁵ 在資料不足的限制下，在解釋何謂公部門效應時，部分研究者傾向於推論為這是單一教育補助政策的效果(蔡淑鈴、瞿海源 1992；吳乃德 1997)。他們認為公部門效應主要是因為公部門福利政策中的教育補助使得外省人的子女更有能力升學(如，吳乃德 1997)。另一方面，王宏仁(1999)卻指出，造成省籍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原因，與其說是教育補助造成的，不如說是個人所屬的家庭社經地位。他認為由於小學與初級中學是義務教育，因此國家的教育經費補助影響並不大。⁶

關於公部門的勞動待遇，如果暫時不區分組織內等級或職位差異，公部門的共同特性是穩定性高、有固定的經濟報酬。此外，還附有一些固定收入以外的福利(fringe benefits)，如早期的食物配給、及直到如今還存在的退休金及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因此，教育補助費在軍公教部門受雇者的勞動報酬中的重要性其實相當有限。整體而言，公部門對教育成就的影響是相當清楚的。只是這個影響是否完全是透過單一教育補助政策所造成，則是本文將試圖釐清的。

4 根據她的統計分析，回答男孩應受到大學教育的福佬人有 19.9%，客家人與外省人分別是 24.7% 與 27.3%；回答女孩應受到大學教育的福佬人有 13.0%，客家人有 14.4%，外省人則有 19.6%。

5 駱明慶(2003)的研究發現，由於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1950 至 1961 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族群有進入公務體系的優勢。隨著公務人員錄取機會的修正，此一優勢逐年遞減。

6 台灣是從 1947 年開始實施六年國民小學的義務教育，1968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教。

(四)外省族群在台北市的群聚效應

族群社區(ethnic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y)是晚近西方族群研究發展出的重要概念。無論是出於自願選擇或是被迫決定,族群在居住上的特殊性,往往界定了一條看不見的線,創造出有形或無形的社區隔離。族群的社區群聚往往會形塑出特殊的文化態度與社會網絡,形成族群內部同質的教育或職業價值觀。當然,並非所有的族群社區效應皆是正面的,它可能有助於成員或其下一代的向上流動,卻也可能反向捆綁其流動的機會,端視其整體的社會處境是否擁有足夠的優勢資源。William J. Wilson(1987)即指出,非裔族群之所以無法脫離劣勢,主要原因之一是群聚於貧窮的族群社區,使其較少接近「主流」的工作典範,因而阻礙了其在教育與工作的期許及向上流動的機會。M. Patricia Fernandez-Kelly(1995)指出,被隔絕的邊緣性社會網絡限制了非裔子弟走出族群貧民窟的可能性。相對的,Zhou(周敏)(1997)援引社會資本的概念,指出族群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一種,為子女的學習提供了社會支持與社會監控的正面力量。她發現,族群網絡中的亞裔移民家庭及其子女,由於經常相互激勵與監督,有助於克服外在環境的不利因素。而此一網絡的建立也與族群群聚現象有關。

如果族群社區與都會優勢重疊,也可能產生加乘效果。以美國為例,大紐約地區是全美國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核心地帶。Barry R. Chiswick(1983)的研究即曾指出,猶太裔美國人有48%集中在紐約、紐澤西以及康乃狄克州這三個大紐約都會區,相較之下,其他族裔的美國人居住於此的比例則只有20%;原本就較為重視子女學校教育的猶太族群因而有較高比例的人口可以受惠於紐約的人文及社會資源。

在台灣,由於外省族群作為政治移民的歷史特性,使得它比其他的族群更為集中居住在都會區,特別是首都台北市。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一項調查(2004),外省族群的人口總數中有將近六成(59.4%)集中在台北縣市、高雄縣市以及省轄市都會區;閩客族群居住

於都會區則僅有四成多(44.0%)。如果僅就台北市來看，這項調查也顯示，外省族群中有20.8%居住在台北市，其他族群的相對比例則只有10.7%；外省族群居住在台北市的機率比其他族群高出一倍。也有學者計算1966年時不同地區的族群人口分配，發現外省人中居住在台北市的比例更是高達36.3%(王甫昌 2002: 35)。外省族群因而有較高比例的人口可以利用台北市豐厚的經濟及社會資源，有利於下一代的學習，以及認知到高等教育對於在都會區找到理想工作的重要性。

再從機會結構的觀點來看，過去的研究也發現，由於資源的差距，都會區的高等教育機構較多，都會區上大學的機率遠高於非都會區，台北市又高於其他都會(駱明慶 2002)。⁷ 因為外省族群有高於其他族群的比例集中在台北市，首都所擁有的多樣化及高數量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其子女高教育成就的重要作用機制之一。Tsai與Chiu(1993)的研究發現在中學以上學歷的取得上，族群身分的效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親的職業、教育程度以及居住於都會區與否。Wang(王宏仁)(2001)也有類似的發現。Lin(林南)(1997)控制居住地以及農業與非農業部門(某種程度反映城鄉別)的差異後，發現族群身分對教育取得並無顯著影響。

綜合前面的討論，至少有四個重要機制可用以解釋台灣外省族群子女與其他族群之間在高教育成就上的差異：(1)由於政治移民的特殊歷史，外省族群的父代，平均而言擁有比本省族群父代較高的教育程度，這種優勢也會傳遞到下一代；(2)除了士兵之外，許多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原先的職業特性是屬於白領階級，其中有些人隸屬於公教部門，有些則屬於民間人士。外省族群特殊的白領階級特性，對子女教育成就也形成一定的正面影響；(3)作為許多外省族群的主要經濟模式，公教家庭的收入穩定以及對文憑的強調會使得父母對子女

7 駱明慶(2002)所定義的都會區包括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新竹市以及基隆市。

有較高的教育期待，其子女也可能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成就。由於教育補助僅為軍公教福利中的一環，即使有助於子女升學，也無法完全取代公部門的影響；最後，(4)由於台灣中央政府所在地為台北市，高比例任職於公部門的外省籍家庭於是較有可能集中居住在台北市，同時也帶動其他外省人聚集在台北市的機率。再加上高等教育與文化資源集中於台北市等結構條件，均有助於外省籍後代獲取較高學歷。以下我們將說明本文的資料來源、分析策略、及所使用的變項。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假設

(一)資料來源

台灣多數關於族群教育經驗差異的研究是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如，黃毅志 1999)，或是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如，駱明慶 2001)。雖然都是全國性的抽樣調查，但由於並非專門為族群研究設計，這兩項調查可使用的變項因而受到一些限制。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是一項在國科會專題計畫下所進行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以下簡稱「台灣族群調查」)(王甫昌 2000)。這項於1999年所進行的調查是對全國20到70歲的人口進行隨機抽樣，總共訪問了3,500個樣本。由於該調查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族群研究，有較多題目反映族群經驗的差異。與本文相關的題目即包括受訪者父親任職單位的部門別、是否領取過軍公教子女的教育補助費、及是否居住過眷村等。

在研究策略上，本文的依變項是完成大學教育與否。除了義務教育之外，台灣高中職以及專科教育也頗為普及。但至少在近幾年大量擴充之前，大學教育機會仍然有限，而且就讀成本較高，大學文憑仍然是台灣社會高教育成就的一項指標。因此，以是否擁有大學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作為依變項，應可更敏銳地呈現造成外省族群教育優勢的

原因。利用2000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蔡淑鈴(2004: 73)探討獲得大學及專科學歷與否的分析，發現父母的教育成就和職業地位均有顯著的影響。雖然與本文所使用的大學學歷與否有些差異，但由於這是較相近的研究，作者將在之後的行文對照本文與其之分析結果。

(二)變項的操作化與研究假設

父親的教育程度對於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幾乎已經是文獻上的一致發現。本文的假設也是如此(假設一)。平均而言，移民來台的外省族群第一代擁有較優勢的教育背景，預期會有利於其下一代整體的教育水準。

階級位置是代表台灣族群之間社會結構差異的一個重要指標。過去的研究顯示，由於處於經濟上的弱勢以及職業傳承的影響，農、工階級的子女在教育階層化的結構中最有可能處於下層的位置。相對的，白領階級較重視子女人力資本的養成。而資本家階級雖然擁有最優勢的經濟地位，但期待下一代具有承接家庭事業的能力可能更勝於對教育重視的程度。因此，我們預期在所有的階級位置中，**父親為白領階級的受訪者，獲得大學或以上教育成就的機率也較高(假設二)**。

為了與現有的研究對話(如，吳乃德1997；駱明慶2001)，關於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的測量，我們將受雇於政府或公營企業的工作者列為一類，其它的就業部門則合併為另一類，以突顯受雇於軍公教部門者的子女教育成就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前面提及，軍公教部門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位置，受雇者具有穩定的工作，子女的教育較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的不穩定而無法升學或被迫中途輟學。再從職業傳承的效應而言，由於學歷是進入公部門的重要條件之一，尤其是大學文憑，父親任職於軍公教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應會有更高的期望**，其子女的教育成就也會相對較高。由於資料的限制，過去的研究無法釐清

軍公教部門對教育成就的影響是否等同於軍公教補助政策的影響，驅使我們著手進行這個研究。我們認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必須被實證資料檢驗的命題。根據過去的研究，本文首先假設領取軍公教補助這個變項對於教育成就具有正向的影響。這是本文的第三個假設。因此，「台灣族群調查」中關於受訪者是否領取過軍公教補助費的題目，將用於分析模型中。至於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與教育補助單一政策的效果之間，是否為完全重疊的關係。我們的假設是：**即使控制了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這個變項，由於穩定的經濟生活及父母的期望，軍公教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應還是有獨立的影響(假設四)。**

最後，本文也將檢驗族群群聚效應的影響，所使用的變項是「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這個變項同時代表教育機會結構的區域性差異和族群群聚經驗。就第一個意義而言，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由於人口較多、經濟條件較佳，中級和高等教育的機構通常也愈多，即使成績不好，學生也相對有較多的升學機會。再就族群群聚經驗的差異來說，本文的第二節提到，外省族群集中於台北市的比例高於其占全國人口數的比例，教育文憑也是在都市內尋求發展的重要籌碼。我們預期居住於台北市對於受訪者獲得高教育成就有正面影響(假設五)。

整體而言，作者認為在台灣的外省族群家庭所具有的特性是：集中於軍公教部門、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高比例居住於首都台北市，以及遷移到台灣時即擁有平均較高的教育水準。控制這些因素之後，即使族群類別(閩南、外省、及客家)依然呈現顯著效果，其解釋力至少將大為降低。本文的第六個假設是：**在控制這四個機制之後，族群的影響將會呈現不顯著或是解釋力有限。**

在變項的操作上，父親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分成小學／國小或以下，初中／國中畢業(或肄業)、高中／職或專科學校畢業(或肄業)、及大學或以上畢業(或肄業)，而以最後一項為對照組。受訪者父親的階級測量主要根據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及工作場所的特性區分，所依

據的資料是受訪者15歲時父親所從事的職業。⁸ 本文將階級位置分成資本家、白領階級、小資本家、農民、及藍領階級五類。在分析時，是以白領階級為對照組。「台灣族群調查」也詢問了受訪者父親的就業身分及部門別。在本文的分析中是將任職於政府部門、公營事業單位、及學校者均列入軍公教部門，至於領取教育補助費的變項，在調查中回答曾經領取過軍公教補助的受訪者被歸為一類。為了凸顯外省人集中於台北市的現象及可能因而產生的教育優勢，本文將居住於台北市視為一類，住在所有其他地區的受訪者合列為另一類。另外，受訪者的年齡與性別是一般教育階層化研究中常用的變項，在本文中也將被當作控制變項。一般在分析薪資或教育年數時，為控制年齡效果的遞增或遞減，除了年齡之外，研究者會加入年齡的平方值。由於本文的依變項是虛擬變項，並非一個連續值，使用平方值以呈現增、減效果並無實質意義，因此在分析模型中未加入年齡的平方項。最後，Perlmann (1988)提到影響教育成就的結構性位置不只是社會面的，還包括家庭結構，主要是指人口組成。在「台灣族群調查」資料中，有一個題目詢問受訪者的兄弟姊妹人數。本文在分析時也加入此一變項。

四、研究發現

表一所列的是各變項的次數分配，我們僅扼要討論幾個關鍵性變項的結果。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主要分布於高中、高職、或專科學校層級。受訪者父親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國小及小學以下」者，占全體樣本的71.0%。父親的工作屬於農、工階級者，合計為65.7%。至於就業部門的分布則相對較為分散：超過40%的受訪者父親屬於自雇階級，另有接近15%擁有雇主的身分，超過22%的受訪者父親受私人企

8 若父親已經去世或退休，「台灣族群調查」則詢問去世或退休前的工作。

表一：變項描述統計

變項名稱	百分比	樣本數
受訪者性別		3,496
男	50.1	1,752
女	49.9	1,744
受訪者平均年齡	41.2	3,495
受訪者父親省籍		3,365
閩南	75.9	2,554
客家	10.3	347
大陸各省	13.8	464
受訪者教育程度		3,487
國小(小學)或以下	27.1	946
國中(初中)	13.1	456
高中職、專校	46.3	1,616
大學或以上	13.4	469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3,364
國小(小學)或以下	71.0	2,389
國中(初中)	9.8	329
高中職、專校	13.8	464
大學或以上	5.3	182
受訪者父親階級		3,057
資本家	9.1	278
白領階級	17.6	538
小資產階級	7.6	232
農民階級	34.1	1,042
勞工階級	31.6	967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		3,115
自己一個人，沒有雇用其他人	40.3	1,254
為政府或公營企業工作	17.5	544
自己當老闆，且雇用其他人	14.7	458
為私人雇主工作	22.2	692
其他、幫家裡工作	5.3	167
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3,496
是	7.1	248
否	92.9	3,248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		3,432
台北市	10.6	365
其他地區	89.4	3,067

業雇用，超過 17% 受雇於軍公教或國營事業部門。而僅有 7.1% 的受訪者回答曾領取過軍公教子女的教育補助費。

由於本文的研究主題是關於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針對族群和其他自變項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做了交叉分析，結果陳於表二。根據表中的數據，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閩南籍的受訪者有超過四分之

表二：族群與各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

變項名稱	閩南族群	客家族群	外省族群
受訪者教育程度**	(2,546)	(346)	(464)
國小(小學)或以下	29.5	24.3	8.8
國中(初中)	13.8	12.1	7.3
高中職、專校	45.2	50.3	56.7
大學或以上	11.5	13.3	27.2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2,471)	(333)	(442)
國小(小學)或以下	76.2	72.1	38.0
國中(初中)	9.0	11.7	13.6
高中職、專校	12.2	12.9	25.3
大學或以上	2.6	3.3	23.1
受訪者父親階級	(2,237)	(319)	(392)
資本家	9.3	7.8	10.5
白領階級	12.6	16.3	50.5
小資產階級	8.2	8.2	5.4
農民階級	36.0	42.3	7.9
勞工階級	33.8	25.4	25.8
受訪者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	(2,279)	(321)	(393)
是	11.6	16.5	45.5
否	88.4	83.5	54.5
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2,554)	(347)	(464)
是	3.2	4.6	32.3
否	96.8	95.4	67.7
受訪者 15 歲以前居住地	(2,552)	(346)	(404)
台北市	9.9	5.8	22.0
其他地區	90.1	94.2	78.0

* 括號內為樣本數，其餘為百分比。

** 根據 χ^2 檢定結果，表中各自變項類別間的族群差異均達統計顯著 ($p < .0001$)。

一、客家籍則有接近四分之一具有國小或以下程度，外省族群僅有該項學歷的比例只有8.8%。但後者中有27.2%是大學畢業或擁有更高學位，閩南及客家籍擁有同樣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只有11.5%及13.3%。外省族群受訪者擁有大學文憑的比例是閩南族群的2.4倍、客家族群的2倍。這三個族群在中學教育階段的分布也有差距，但不及小學及大學階段明顯。

至於父親教育程度的族群分布，閩、客籍受訪者的父親輩中超過70%只有國小或低於國小程度的學歷，外省籍擁有這項學歷的比例幾乎只有這兩個族群的一半，為38.0%。在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分布上，族群差異也十分明顯。外省籍的父親輩中有四分之一具有高中(職)或專科的學歷、接近四分之一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外省籍父親輩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接近閩南籍的九倍、客家籍的七倍。和受訪者相比，不同族群之間上一代教育程度的差異更為明顯，高教育程度確實為外省籍第一代的集體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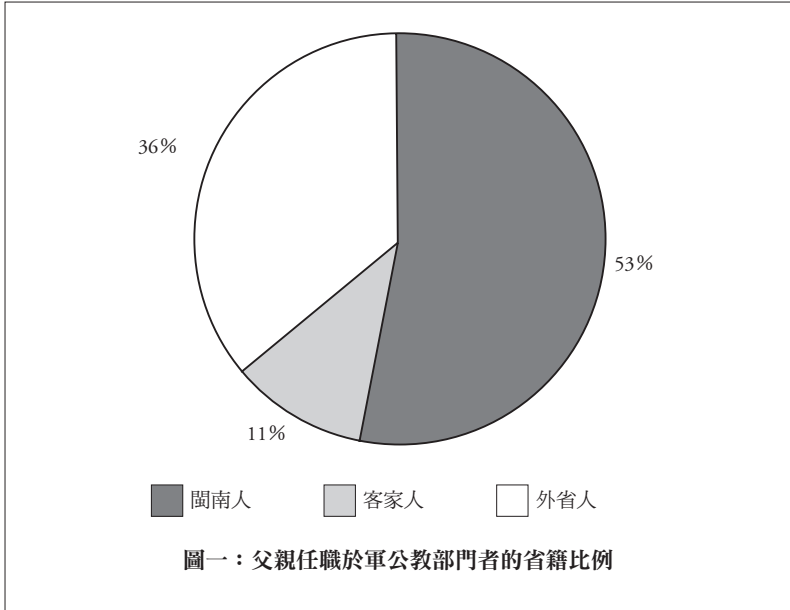
在階級分布上，有接近七成的閩、客受訪者父親屬於農、工階級，外省籍的比例只有33.7%，還不及這兩個族群的一半。相對的，外省族群父親輩屬於白領階級的比例為50.5%，遠高於閩(12.6%)、客(16.3%)族群，族群間階級位置分布的差異也十分明顯。

外省籍受訪者父親的就業部門也顯著地集中在軍公教部門(45.5%)。此一族群受訪者曾領取過軍公教補助費的比例也相當高，為32.3%，也成為外省族群的特色。

相對於另外兩大族群，外省籍受訪者15歲之前居住於台北市的比例高達22.0%，也遠高於閩南和客家籍受訪者(分別為9.9%及5.8%)。

為了釐清教育補助費與公部門之間的重疊性，在呈現多變項分析的結果前，我們先用圖形說明族群、軍公教部門、及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否三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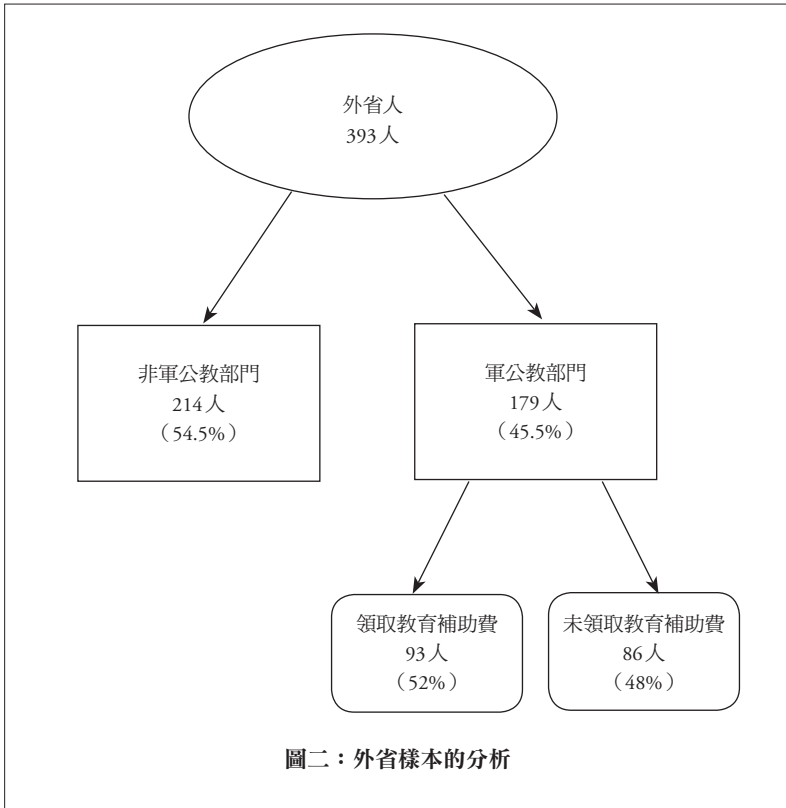
圖一顯示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者的省籍比例。在這個部門中，



53%的就業者為閩南族群，其次為外省(36%)及客家族群(11%)。因此，外省人當中進入公部門的比例雖然相較其他族群為高(見前面的表二)，不過，外省族群占軍公教部門所有受雇者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將這個部門等同於外省人，並非正確的推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與其他兩個漢人族群相比，客家人父親輩屬於公部門的比例明顯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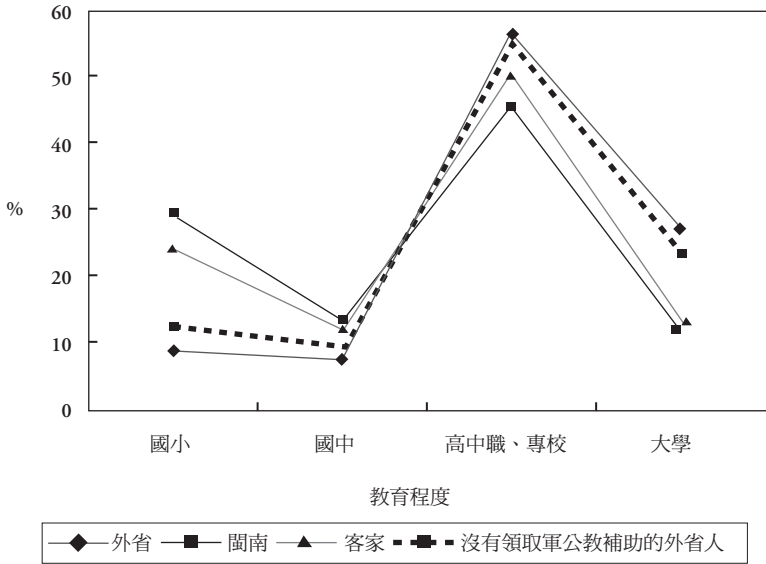
圖二是針對393位外省人樣本分析的結果。⁹ 在這個樣本當中有45.5%其父親曾經或現在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而在這些受訪者中，有略超過一半的人曾經領取過教育補助費。兩者相乘，父親在軍公教部門、同時拿過教育補助費的外省人比例為23.7%。因此，一方面超過一

9 根據原來的調查資料，外省樣本有464人，其中有37人回答其父親沒有工作，另有32人回答「不知道」父親的工作或拒答。而在剩餘的395人中，又有2人被列為「不適用」。



半的外省受訪者，其父親並不任職於軍公教部門；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父親在軍公教部門工作的外省人都領取過教育補助費。當然，家庭中母親或是其他監護人也有可能任職於軍公教部門，使得受訪者可以領取教育補助費。不過，軍公教部門中的約聘人員、在私立學校任職的人員、或是領取單一薪俸者，是不能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父親任職軍公教部門確實不代表就必然會領取教育補助費。過去的研究將父親任職軍公教部門的顯著效果推論為是因為領取教育補助費的關係，有可能是過度推論。

至於圖三則是比較不同族群受訪者在各教育階段的比例，及去除



圖三：不同族群受訪者在各教育階段的比例

領取過軍公教教育補助費樣本後的結果。在實線部分，三個族群在國、高中的比例相當接近；但是在小學的階段，閩、客族群的比例明顯高於外省族群，而在大學部分則外省籍的比例明顯高於另外兩個族群。¹⁰ 虛線部分是未曾領取過補助之外省人在各教育程度的比例。即使未領取教育補助，這些外省籍受訪者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仍明顯高於閩、客族群；而國小畢業的比例則明顯低於閩、客族群。這個簡單的描述性分析顯示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外省族群高教育程度之間並未如過去一些文獻所宣稱的是高度相關。由於這三個漢人族群在大學教育階段呈現明顯的差異，本文在研究策略上決定使用具有大學或更高學歷作為依變項，也是符合圖三結果所示。

合併這三個圖所顯示的訊息有兩個，第一，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

10 這也是表二所呈現的結果。

門並不同於子女領取教育補助費。第二，扣除領取教育補助費的受訪者之後，外省族群仍然擁有相對於其他族群較高的教育成就。以下的多變項分析將試圖進一步釐清四個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機制的各自效果。

表三所示為影響受訪者高等教育成就的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將獲得大學或碩博士學位者視為一類，其他學歷的當作參考組。為比較主要變項對於模型解釋力的影響，表中的模型是逐步加入預測變項。最後一個模型則包括所有的變項。為了驗證過去關於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對於外省族群教育成就的影響，我們首先放入這個變項。¹¹ 模型一顯示，領取過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的受訪者，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高於沒有領取過的受訪者。但此一變項的解釋力約只有4%。

模型二的結果顯示，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受訪者，確實有較高的機率獲得高等教育學歷，符合原先的假設。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補助費的測量是限定為軍公教類別，因此與軍公教部門這個變項之間有一些重疊，應是可以被預期的(亦請參考圖二)。根據模型二，領取過教育補助費與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均有顯著影響。這顯示了軍公教部門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機制並非與教育補助費的作用完全重疊，而是另有其他機制。

事實上，在整體分析中，解釋力最高的變項是父親的階級位置和教育程度。我們首先說明加入階級後的效果。根據模型三，和白領階級相比，小資產階級、農民與工人階級家庭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較低(後續的分析將顯示，即使陸續加入其他家庭和個人變項之

11 本文作者在處理分析模型時，試過許多組合，包括將族群作為第一個放入的變項或是先考慮軍公教部門等。由於教育補助費的領取被有些研究視為造成外省子女高教育成就的關鍵，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也有這個變項。為凸顯此一變項的重要性，我們於是將領取過教育補助費與否作為分析模型中第一個放入的變項。

表三：影響高等教育成就之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大學或以上程度=1)

自變項	1	2	3	4	5	6	7
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無=0)	1.580*** (.142)	1.014*** (.174)	.735*** (.177)	.498** (.186)	.456* (.189)	.426* (.197)	.401* (.203)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非軍公教部門=0)		.834*** (.136)	.156 (.164)	.122 (.169)	.143 (.171)	.168 (.173)	.321* (.180)
受訪者父親階級(白領階級=0)							
資本家			.043 (.192)	.399* (.205)	.366* (.208)	.394* (.210)	.441* (.215)
小資產階級			-.744** (.236)	-.182 (.254)	-.212 (.259)	-.203 (.260)	-.224 (.226)
農民階級			-2.206*** (.218)	-1.415*** (.244)	-1.356*** (.249)	-1.322*** (.252)	-1.121*** (.259)
勞工階級			-1.077*** (.160)	-.436 (.182)	-.417* (.183)	-.398* (.184)	-.444* (.190)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大學或以上=0)							
國小				-1.714*** (.213)	-1.751*** (.218)	-1.783*** (.223)	-1.509*** (.234)
國中				-1.258*** (.235)	-1.299*** (.240)	-1.329*** (.243)	-1.187*** (.252)
高中職、專校				-.804*** (.197)	-.824*** (.200)	-.842*** (.206)	-.787*** (.213)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非台北市=0)					.474** (.154)	.450** (.155)	.466** (.159)
受訪者父親省籍(外省=0)							
閩南						-.005 (.169)	-.063 (.175)
客家						.179 (.233)	.110 (.238)
受訪者年齡							-.023** (.007)
性別(男=0)							-.407** (.120)
兄弟姊妹數							-.016 (.036)
常數項	-2.039***	-2.112***	-1.061***	-.156	-.207	-.192	.695*
Log-likelihood	-1,322.4	-1,191.1	-1,081.7	-1,027.0	-1,001.2	-985.5	-951.4
Pseudo R ²	.040	.052	.123	.152	.160	.159	.166
分析樣本數	3,487	3,097	3,029	2,950	2,907	2,809	2,765

* p<.1; * p<.05; ** p<.01; *** p<.001.

後，農、工階級的弱勢狀況仍持續存在，而農民階級的子女尤其處於不利的位置)。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入階級變項之後，獲得教育補助費與否的影響固然減弱，但父親所任職的部門別卻變得不顯著。關於公部門與階級變項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會在最後一節做仔細的討論。整體而言，階級變項的加入使得模型的解釋力增加了一倍以上。

第四個模型顯示關於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符合原先的假設，同時也與過去教育階層化的研究一致：父親的學歷愈高，子女的學歷也就愈高。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同時減弱了階級和領取軍公教補助費的部分效果。

模型五的結果顯示，受訪者15歲以前是否居住於台北市在統計上也有顯著效果。幼時居住在台北市的受訪者獲得高學歷的機會大於居住在其他地區的受訪者。¹² 加上此一變項後，勞工階級子女的教育成就不如白領階級的現象再度在統計上出現顯著。

在模型六中，我們加入族群類別，以檢驗在控制其他重要的影響機制後，族群本身差異的效果。這與之前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包括Tsai與Chiu(1993)、Lin(1997)、及Chen與Lin(2005)，都相似。顯示父親的階級、教育程度、和幼時居住地等，是區分族群身分差異的重要因素。

最後一個模型則是將其他控制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及兄弟姊妹人數，全部放入後的結果。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與否、父親的階級位置和教育成就、受訪者幼時居住地的效果依然顯著。年齡及性別的影響方向也大致符合一般的預期：年輕世代及男性，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較高。意外的是，在考慮個人特徵後，軍公教部門的效果反而提升：顯示部門別效果的變異性相當大。和最初的模型一相比，模型

12 這個結果也與駱明慶(2001)的發現一致。此外，本文也曾嘗試分析眷村的效果。在單獨放入「居住於眷村」後，效果是顯著的；但在加入族群變項後，眷村的居住效果即不再顯著。且由於居住於台北市已足以反映族群的群居效應，於是在模型中未加入居住於眷村的變項。

七的解釋力增加了13%，達到了17%。表三的結果一方面顯示了決定高等教育成就的因素相當複雜，還有很多的因素未被本文所掌握；另一方面，則指出家庭背景與子女教育成就之間的密切關係。

雖然軍公教部門的效果在模型三之後並不顯著，然而由於有將近一半的外省人集中在此一部門、其他族群任職於此部門的比例偏低，部門別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是否在族群內部造成差異，也值得做些檢測。我們於是利用同一模型對各族群進行分析。由於本文的重點是在比較族群間而非族群內教育成就的差異，因此本表的結果將只是陳於附錄。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外省受訪者中，影響受訪者教育成就最重要的因素是父親教育程度、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及性別。而除了(農民)階級外，此一模型沒有其他變項能夠顯著說明客家籍子女間教育成就的差異。相對於領取教育補助費在外省人及客家人各自族群內部都沒有顯著效果，模型中所使用的許多變項可以顯著的區分閩南籍的受訪者之間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例如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否、父親階級、父親教育程度、和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整體來說，不論是在哪一個族群的內部，任職於軍公教部門都沒有顯著的效果，教育補助的效果也只出現在其中一個族群(閩南族群)。

五、結論與討論

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即使教育補助這個變項有顯著影響，其重要性仍遠低於父親階級背景、父代教育程度，甚至是15歲以前居住於台北市等其他族群特徵。有領取補助者也是樣本中的少數，即使排除這群受訪者，外省族群獲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遠高於另外兩個漢人族群。值得注意的是，領取教育補助與否的本身，也是一種成績的篩選。子女如果沒有繼續升學，就不會得到補助；教育補助金確實讓子女升學後可以減少家庭中的經濟壓力，但如果家中的經濟需求更迫

切，則子女甚至缺乏升學的機會或可能性，遑論領取任何形式的教育補助。

大體而言，本文的主要發現與既有文獻吻合。父親作為白領階級、擁有高教育程度、或受訪者幼時住在都會區等，對於下一代獲取高教育成就均有正面的效果。既然外省族群父親輩有高比例屬於白領階級及擁有高等學歷，並且集中居住於台北市，這些族群身分特徵有助於其下一代獲取高等教育成就。本文的貢獻則在於有助於釐清過去研究推論上的一些迷思。第一，藉由分析較為細緻的族群調查資料，使我們更為瞭解教育補助與公部門這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讓爭議已久的猜測，有了被經驗資料檢證的機會。我們的研究發現，教育補助及公部門的影響其實是獨立運作，公部門的影響又遠不及父輩的階級屬性及教育背景。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較可能是建諸於家中較穩定的經濟來源及對子女職業的期望，但是階級傳承的機制是對子女直接的教育期望，這與父親輩任職於私部門或公部門無關。因此，就社會整體而言，部門別並非是一個重要的區分，階級更能夠區隔父親輩對於子女教育期望的差異。階級可以凸顯農工家庭的弱勢及子女升學機會的缺乏。公教部門雖有穩定收入，但是有穩定經濟來源的家庭並不只限於軍公教部門。就教育機會的傳承而言，階級的區隔比部門別差異更重要。本文的發現證實階級以及教育程度的重要性，這與蔡淑玲(2000)使用具有大學及專科學校程度與否為依變項所得到的結果相似。過去的一些文獻似乎誇大了部門別的影響，而對於外省族群的高教育程度有錯誤的歸因。外省籍父親輩有許多的族群特徵或身份，有些身份是有助於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有些則效果相對有限。

由於階級和教育程度是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當外省族群的父輩有較高比例屬於白領階級及高教程度時，這些背景上的優勢自然會惠及下一代。根據陳婉琪(2005)的說法：「教育程度佳、資

源豐厚的家長無論如何都有辦法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提供適時的支援與彌補」，而且這項結果不分省籍。因此，根據本文的分析，閩南族群有較高比例處於上大學的教育機會最為弱勢的農民與勞工階級，族群整體平均教育程度因而低於其他族群。如何從結構面改善農工階級家庭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應該是教育階層化的學者未來關懷的焦點。

如同前面所提及的，族群是獨特歷史的產物，我們不需要尋求單一的主要變項來解釋族群的特質，也沒有一種單一的概化可以囊括多重因素之間的所有關係。移民社群的社會組成特質，移民的原因、過程與路徑，以及遷移到新社會中所座落的社會結構位置，都會影響他們對生存機會的認知，以及相對應的各種適應策略和生命態度的修正。因此，我們對台灣外省族群高於其他族群的教育成就的解釋，必須被放置在這樣的族群脈絡化中來理解。

在台灣，過去的研究者已經解釋了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是，除了更細緻地理解以及詮釋這些差異之外，未來也應進一步去探索不同脈絡下個別族群獨特的歷史經驗，是如何與階級、性別等因素交錯形塑他們今日的風貌。如何以比較的觀點，著眼理論，來解釋個別族群內部異質的歷史，是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附錄：

影響高等教育成就之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大學或以上程度=1)：依族群別分

自變項	閩南	客家	外省
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 (無=0)	.801** (.309)	.820 (.737)	.093 (.294)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 (非軍公教部門=0)	.348 (.235)	-.247 (.547)	.232 (.382)
受訪者父親階級 (白領階級=0)			
資本家	.480* (.261)	.182 (.662)	.573 (.524)
小資產階級	.058 (.312)	-.980 (.785)	-.920 (.866)
農民階級(註)	-.874** (.303)	-1.328* (.702)	
勞工階級	-.258 (.237)	-.833 (.551)	-.698 (.459)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大學或以上=0)			
國小	-1.939*** (.329)	-.946 (.892)	-.814* (.427)
國中	-1.608*** (.359)	-.656 (.905)	-.591 (.426)
高中職、專校	-1.075** (.314)	.456 (.765)	-.851* (.355)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 (非台北市=0)	.495* (.198)	-.623 (.683)	.585* (.306)
受訪者年齡	-.025** (.008)	-.031 (.021)	-.005 (.016)
性別 (男=0)	-.413** (.146)	-.304 (.387)	-.552* (.272)
兄弟姊妹數	-.011 (.041)	.004 (.114)	-.003 (.102)
常數項	.880 (.389)	.743 (.895)	.069 (.677)
Log-likelihood	-667.2	-101.0	-169.6
Pseudo R²	.157	.196	.100
分析樣本數	2,141	303	303

* p<.1; * p<.05; ** p<.01; *** p<.001.

註：由於樣本中外省族群屬於農民階級的人數相對太少(表二)，因此分析時這個類別被統計軟體自動排除。

參考文獻

- 王宏仁，1999，〈1950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 1-35。
- 王甫昌，2000，《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88-2412-H-001-012。
- ，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 11-78。
- 吳乃德，1997，〈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167。
- 林鶴玲，1998，〈省籍性別文化的經濟影響：台灣家庭資源配置策略的省籍性別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4): 611-659。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台灣社會學刊》19: 95-139。
- 張晉芬、蔡瑞明，2006，〈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台灣全志·社會志》，9。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 117-152。
-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147。
- ，2003，〈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的省籍篩選效果〉。《經濟論文叢刊》31(1): 87-106。
-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 1-44。
- 蔡淑鈴、瞿海源，1992，〈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 (1): 98-118。
- ，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7: 47-88。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北：巨流。
- 齊邦媛、王德威，2004，《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
- 鍾基年，1993，《族群特質與職業生涯：外省籍族群從事軍公教行業原因之探討》。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Becker, Gary Stanley, 1993[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dnar, John, 1976, "Materialism and Morality: Slavic American Immigrants and Education, 1890-1940."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 1-19.

- Bourdieu, Pierre,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Beverly Hill, CA: Sage.
- Chen, Vivien Wen-chun and Evelyn Yu-ling Lin, 2005, "Political Exclusion or Socioeconomic Reproduction? Ethnic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教育階層化與家庭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Child, Irwin Long, 1943, *Italian or Americ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Conflic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iswick, Barry R., 1983, "The Earnings and Human Capital of American Jew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8: 313-335.
- Fernandez-Kelly, M. Patricia, 1995,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rban Ghetto: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mmigration." Pp. 213-247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dited by Alejandro Portes. New York: The Russell Sage.
- Goldscheider, Calvin and Alan S. Zuckerman, 1984,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ley, Andrew M., 1976, "The Ethnic Miracle." *The Public Interest* 45: 20-36.
- Hirschman, Charles and Luis M. Falcon, 1985,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Relig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5: 83-120.
- Kohn, Melvin L., 1984,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on Parental Values and Practices." Pp. 119-132 in *Work and Family: Changing Roles of Men and Women*, edited by Patricia Voydanoff. Palo Alto, CA: Mayfield.
- Lin, Nan, 1997,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Pp. 103-145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and Fu-Chang Wang. Taipei: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Perlmann, Joel, 1988, *Ethnic Differences: School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Irish, Italians, Jews, and Blacks in an American City, 1880-19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2): 188-202.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67,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Wang, Hong-Zen, 2001, "Ethnicize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Owners of Small- and Medium-Scale Businesses." *Modern China* 27(3): 328-358.
- Warner, W. Lloyd and Leo Strole, 1945,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hou, Min,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975-1008.